

# 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sup>\*①</sup>

许雁

**摘要** 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被尊称为“莫斯科的孔夫子”，他在古代中国历史研究、儒家典籍《论语》译介及孔子思想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在数十年汉学研究历程中，贝列罗莫夫形成了对中国的基本认知。本文基于贝列罗莫夫的汉学研究成果，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从他对古代中国的关注、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发展的预测3个维度挖掘该汉学家的中国观。

**关键词** 俄罗斯汉学家 贝列罗莫夫 中国观 孔子

DOI:10.16238/j.cnki.rla.2023.04.013

有关“中国观”的概念，学者王毅曾指出：“‘中国观’一词的英文有‘images of China, views (viewpoint) of China, perceptions of China, concepts of China,’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images of China’，汉语译名也无统一标准。学界除了使用‘中国观’外，还同时使用‘中国形象’‘中国印象’‘中国意象’等词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内同时使用上述词语。”<sup>[1](100)</sup>汉学家的“中国观”概念中认知主体是汉学家，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的域外学者群体。客体为中国，具体地说，是指汉学家群体或个体对中国社会整体或其中若干方面的认知和感受，这些认知信息既有客观的现实描述，也有主观的自我判断。本文聚焦于当代俄罗斯汉学家贝列罗莫夫(Л.С. Переломов, 1928—2018)<sup>②</sup>的“中

国观”。贝列罗莫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儒学研究专家，被誉为“莫斯科的孔夫子”，在其学术框架中，中国研究具有独立存在意义，他对中国的体认、分析、感悟最终凝结为“中国观”的内容值得国内学界深入挖掘。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发展受到全球瞩目的大语境中，对中国的研究和理解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国的多向度解读。尽管贝列罗莫

---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汉学家的儒学研究”(22JJD740035)的阶段性成果。

①2023年是贝列罗莫夫诞辰9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俄罗斯汉学界的一代儒学大师。

②学界曾将贝列罗莫夫译为佩列洛莫夫、别列洛莫夫、别列罗莫夫、彼列洛莫夫等。本文选取了国内首位介绍贝列罗莫夫的学者——李明滨教授在《莫斯科的孔夫子》一文中的译法：贝列罗莫夫。

夫的“中国观”未形成专题性的论述,但却散见于其译著、论著及论文中。因此,本文将以贝列罗莫夫的代表性汉学研究成果为文本分析材料,结合贝列罗莫夫的文化及学术身份、所处的社会及学术背景探究其中国观的生成与发展,并着重剖析其对古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中国的发展等方面认知的总和。

### 一、贝列罗莫夫其人其著

贝列罗莫夫(汉语名为嵇辽拉)是具有中俄两国血统的汉学家。其父是中国人,名为嵇直,母亲为俄罗斯人。贝列罗莫夫出生后入俄籍,随母姓,并在俄罗斯接受教育。

贝列罗莫夫的中国研究结合两个时间维度——古代与当代。早年间,他从事古代中国史研究,后期转向孔子思想研究,并结合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孔子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贝列罗莫夫致力于深入解读孔子学说,于1981年出版首部与孔子思想相关的著作——《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лег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后于90年代推出孔子研究“三部曲”——《孔子的格言》(《Слово Конфуция》)、《孔子:生平、学说、命运》(《Конфуций: жизнь, учение, судьба》)及俄罗斯汉学史上首部《论语》学术型全译本《孔夫子与〈论语〉》(《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 юй》)。21世纪初,贝列罗莫夫完成阐释儒学当代意义的力作——《儒学与中国当代战略方针》(《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НР》)(2007)。上述著作对于剖析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论著可直观、集中反映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而译著虽不能直接反映汉学家的观点,但可窥见其关注中国的面向。贝列罗莫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剖析不断拓宽与深入,使其对中国的认知得以系统化,称得上“中国观”的学术思想即随之出现了。

### 二、贝列罗莫夫中国观的生成与发展

纵观俄罗斯汉学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帝俄时期对中国这一神秘国度的好奇与向往,后过渡到苏联汉学时期对中国的否定与怀疑,再到当代俄罗斯对中国改革的肯定与探索,俄罗斯社会理解中国的历程是漫长的。如果从1618年彼特林使团来华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开端,那么中俄交往至今已历经四百余年,一辈辈汉学家的中国观也有逐渐发展、深入的过程。汉学家中国观的变化规律正如忻剑飞所言:“是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是与时代前进同步的,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民的觉悟密不可分的,也是与全人类的成熟休戚相关的。”<sup>[2][11]</sup>

#### 1. 多元身份是贝列罗莫夫中国观生成的天然土壤

首先,贝列罗莫夫从小在俄罗斯生活并接受俄罗斯文化的熏陶,具有俄罗斯文化的“先结构”,而同时他心中仍有一份“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其父的影响下,贝列罗莫夫从小就表现出对研究中国及

其文化、哲学、历史的兴趣,并将之付诸于个人的学术活动中。贝列罗莫夫精通古汉语,毕生探究孔子思想,中国文化对贝列罗莫夫的影响不逊于俄罗斯文化。中俄两国血统的融合塑造了贝列罗莫夫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其在情感上具有对中国天然的认同感,这无疑是酝酿其中国观生成的重要前提。正如贝列罗莫夫本人在启动《论语》翻译活动前的自述:“近20年来,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对于读者而言,不知为何我仍有未尽的责任。看来,是我的血缘背景决定的。”<sup>[3](406)</sup>由此可见,贝列罗莫夫的中国研究一方面来自工作职责,他对中国学问涵泳一生,积思数十载将研究心得公之于众。另一方面,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不仅有理论上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感的显现。

再者,贝列罗莫夫身兼汉学家与译者双重学术身份,《论语》译著正是其多年从事孔子思想研究的“产品”。如上文所述,贝列罗莫夫的汉学研究涉及古代中国历史、孔子思想及当代中国三大方面,其汉学研究与翻译实践相辅相成,多元的学术经历和研究背景使其具备多元化的知识储备,进而在汉学研究中酝酿着翻译活动,在翻译过程中同时拓展着研究的深度,贝列罗莫夫的治学路径可谓是为译而研、为研而译、译研结合的研究模式。此外,贝列罗莫夫是努力将传统汉学研究转向当代中国学研究的关键人物,由此而得名“俄国新儒学的代表”。<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列罗莫夫的身份不仅是汉学家、译者,还是中国学家,他提出了两个重要主张:一是主张传统汉学成为与当今社会

相关的学科;二是强调研究当代中国一定要基于该国的传统文化。

贝列罗莫夫以多元的文化、学术身份置身于中俄知识与文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研究基础,这使得其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汉学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使其具备了认知中国的坚实基础。

## 2. 新时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推动了 贝列罗莫夫中国观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格局经历着重大改变。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变革导致整个社会进行文化反思,民族文化和心理受到巨大冲击,“俄罗斯民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sup>[4](36)</sup>在寻求新出路之际,以贝列罗莫夫为代表的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对本国现状深感痛心,认为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同样应该挖掘本源、推陈出新,如同“双头鹰”一样既要望向西方,也要看到东方,尤其是中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高度关注,这使得“世人皆醉我独醒”<sup>②</sup>的俄罗斯汉学界及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不同程度地开始对当代中国表现出研究兴趣,汉学家积极思考从东方文明中找到发展动力的可能性。正是如此的时代背景进一步推动了贝列罗莫夫对中国的研究与介绍,他认为:“俄罗斯在二十一世纪,应该建立本国基于

<sup>①</sup> 李明滨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一书中将贝列罗莫夫称为“俄国新儒学的代表”。

<sup>②</sup> 季羨林先生曾将汉学家描述为“世人皆醉我独醒,区别于西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的群体。详见:《汉学研究》2000年第六集,第3页。

恢复精神传统的发展模式。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及儒家文化圈国家、地区的发展,给了我们很好的利用儒家文化的宝藏的例子。”<sup>[4](38)</sup>“中国机遇论”开始成为俄罗斯国际社会舆论的主流,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就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发展。

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学术境况也发生了巨大更迭,俄罗斯汉学界不断呈现出中国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陈开科曾对该时期的学术环境进行如下描述:“因时代冲击,促使俄罗斯汉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学者们在民族危机的感召下,从书斋走出来,走向社会,把自己的所学和社会的需要相结合。”<sup>[5](145)</sup>当时,传统汉学研究开始出现式微征兆,而当代中国学研究逐渐成为海外汉学界的关注点。在此背景下,贝列罗莫夫由专研经典文献的传统汉学转向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中国学。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在贝列罗莫夫看来,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孔子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愈来愈得以显现。因此,他以孔子思想为“路径”,以当代问题为“出口”,进一步深化了个人的中国观。

综上,多元的文化与学术身份酝酿了贝列罗莫夫中国观的生成,新时期的学术与时代背景进一步推动了贝列罗莫夫中国观的发展。

### 三、贝列罗莫夫中国观的主要面向

#### 1. 中国是“尚古”的国度

要构建汉学家完整的中国观,则必须

重视其对古代中国的认知。贝列罗莫夫以史学研究起步,古代中国是其认知中国的原点。

贝列罗莫夫从事古代中国研究所依托的语境是孔子生活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塑造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察对于了解中国具有关键性作用。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学者,贝列罗莫夫非常重视该时期的历史研究,他强调:“要分析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必须首先弄清楚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历史中的转折点。”<sup>[6](65)</sup>贝列罗莫夫将春秋战国时期称作“最具戏剧性”的时代,<sup>[7](14)</sup>他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如下描述:

当时的中国在长期经历各诸侯国的内讧战争之后,呈现出‘七雄争霸’的复杂局面。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在世界历史上寻找可与20世纪比较的时期,最终选择了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并认为彼时社会局面的紧张程度类似于20世纪各国之间的战时场面。<sup>[7]</sup>

贵族代表着某个地区的领导者,早已习惯统领本地区的政事。他们甚至干涉帝位的继承——去除异己,把自己人推向王位。贵族强大的原因在于,几乎所有重要的行政职位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sup>[7](15)</sup>

该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得到发展,构建新制度本身的必要性加上相对发达的文字水平决定了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所谓的中国哲学“黄金时代”。<sup>[8](5)</sup>

我们从贝列罗莫夫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描述中总结出该时期的3大特征:其一,该时期是城邦之间连年征战的阶段;其二,贵族权力扩大化,逐渐呈现出超越皇权的趋势;其三,该时期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长久地使中国文化产生创造力并真正地确定了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sup>[8]</sup>同时贝列罗莫夫关注到,公元前6—公元前3世纪是“政治—历史”(политика-история)<sup>[8](6)</sup>制度产生与形成的阶段,当时的政治术语中与之等值的概念即是“古”(древность)。他不止一次提到“古”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曾对“古”进行如下描述:

“古”这个词的概念容量很大,已在公元前6—公元前3世纪被完全确定下来,有时带有“传统”的意义。古代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常运用“古”的概念,无论目的是什么,“古”的使用对于所有哲学和伦理政治学派都很典型,它常用于伦理政治概念中。当谈到构建理想社会或强大国家时,所有概念、原理都不能忽视“古”。孔子、管仲、墨子、老子、商鞅、孙子、韩非子及诸多古代中国思想家皆诉诸于“古”,运用神话的、真实的历史形象,同时也将古时的制度运用到自己的理论构建中。<sup>[8](6)</sup>

此外,针对中国社会“尚古”传统的形成,我们将贝列罗莫夫的思路梳理如下: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领导层对合理管理人民的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种需求使国家内部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当时社

会将之命名为“士”。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士”指军人或小官吏。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自由且有知识的群体,他们中大多数人积极参与到脑力活动中。有些中国学者将“士”解释为“最初的知识阶层”,但该词在俄语中译为“книжник”(书籍专家)更为合适,因为“他们熟知本国的历史知识,在自己的学说中时常引用神话领袖——如尧、舜等人的功绩。”<sup>[7](16)</sup>“古”的引文在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被认为是最有力、最无可争辩的论据。“士”的工作方式则为“尚古”,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在中国文化中即形成了对“古”的尊重,同时产生了“尚古”的传统。中国社会重视“古”的当代意义,“古为今用”<sup>[8](8)</sup>始终是中国政治思想生活的重要元素之一,中国历代政治家在寻求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案时皆诉诸于“古”并运用历史事实或古代哲学家的概念作为论据与人民交流。中国政治家在与民众交流时常诉诸于历史,“尚古”是中国政治思维文化的特点。

基于古代中国研究,贝列罗莫夫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尚古”的国度,中国人“尚古”的传统是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的。正因儒家“士”阶层的“尚古”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特质——“具有相对高层次的历史自我意识,了解本国的历史”,<sup>[8](4-5)</sup>“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参加过国家管理的人,具有深刻而敏锐的历史意识。”<sup>[9](7)</sup>中国人尚古的优良传统决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在诸多方面都诉诸于古代及历史”,<sup>[8](4-5)</sup>这是中华民族得以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秘诀。

## 2.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面对改革开放后及新时期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贝列罗莫夫曾提出:“若想了解和理解中国,而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惊讶,则必须研究中国国情特色的深层根源。”<sup>[10](152)</sup> 在面对西方理性思维受到质疑的窘境,俄罗斯社会更加积极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国情特色的深层根源”。因此,贝列罗莫夫更加关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认知也是其中国观的重要面向。

作为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及其思想首先受到了贝列罗莫夫的关注:“不了解孔子及其学说就无法理解我们伟大邻邦(中国)的精神和文化。”<sup>[6](3)</sup> 他在研究中流露出对孔子的崇敬,曾坦言:“尽管身为汉学家,但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畏惧接近孔夫子的学说——因为它太伟大了,研究它需要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知识。”<sup>[3](406)</sup> 贝列罗莫夫一方面肯定了孔子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指出孔子在当时鲁国的威望极高,被称为“国老”,享有全国民众的尊重。另一方面,贝列罗莫夫异于西方汉学界对孔子“宗教领袖”“圣人”的刻板认知,将孔子还原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更加侧重孔子作为“世间人”<sup>[6](3)</sup> 的本身素质,指出其通过“自己创造语言”<sup>[6]</sup> 将思想根植于日常生活与情感之中。“世间人”是贝列罗莫夫对孔子最核心的判断。

对贝列罗莫夫而言,其治学视野中最看重的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其中包括孔

子的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及孔门师徒日常交流等细节。对此类细节的解读能够更加鲜活地呈现出孔子“世间人”的人性特质。贝列罗莫夫视孔子为师者,这体现在他将《论语》全文的“子曰”之“子”译为“Учитель”(老师),并将该词的首字母大写以示孔子作为中华民族“至圣先师”的重要地位。此外,贝列罗莫夫对孔子的教育内容进行了概括:

孔子是号召学习的。但是他所说的知识,不仅仅是指学习他本人的思想而言,……我觉得,孔子把教育看得稍许广泛些,他认为除了行为规范(“礼”)之外,还必须爱好音乐,学会吟诗,就是说,他要求学生熟悉古老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掌握传统的道德财富。他所想象的受过教育的人正是这样的。显然,在孔子看来,音乐也好,诗歌也好,其重要作用,与其说是培养个人的审美观点,不如说是陶冶一个人怎样在社会上为人。<sup>[11](275-276)</sup>

正因孔子的教学内容是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结合,贝列罗莫夫指出孔子学说在中华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孔子学说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及中国人价值取向的确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6](3)</sup> 诚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经历过高潮与低谷,曾走过崎岖的道路。但对于孔子学说在当今中国的存在状态,贝列罗莫夫明确表示,如今重现了对孔子的尊重,孔子学说的低潮不会再复现,因为“儒学创造者(孔子)为其所奠定的精神动力保障了民族稳定的未来。”<sup>[7](5)</sup>

对孔子学说的崇尚是数千年来存在于中华民族意识深处的,要理解孔子学说,则必须深入典籍文本。贝列罗莫夫对《论语》深耕细作,洞悉到孔子学说的整体性及体系性,他“三分”孔子学说,以“人观”“社会观”“国家观”呈现出孔子学说的完整图景。这种解读《论语》的策略突破了前辈汉学家全文翻译原典、简单公式化记录中国信息的汉学研究模式,贝列罗莫夫开始尝试适应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及读者的需求:在忠实汉籍本义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转述部分内容,然后按照个人的理解重构孔子思想。贝列罗莫夫对孔子学说的解读可谓是“俄罗斯汉学界的《论语》‘新解’”。<sup>[12](77)</sup> 贝列罗莫夫尤其关注《论语》在中国“不同寻常的普及程度”,<sup>[13](6)</sup> 他指出:“古代中国稍有学问的人都应知晓《论语》文本中的每个汉字。”<sup>[7](13)</sup> 《论语》在数千年间被世人传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解密中国社会为何如此重视《论语》也是贝列罗莫夫研读典籍的初衷,他通过译介儒学典籍,不但从中感受到儒学思想的意蕴,而且了解和认识到其负载的古代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等信息。贝列罗莫夫翻译、阐释儒家典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寻求中国问题答案,建构中国观的历程。

### 3. 中国的发展基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打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视域界限,用完整的中国观深化汉学研究至关重要。何为完整的中国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研究者不仅要意识到中国是有着

悠久文明的国家,而且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因此,贝列罗莫夫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也是其中国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古代中国经典文献的深耕细作,贝列罗莫夫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逐渐感受到中华文明存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强大生命力。这使他相信,中华文明蕴含着自我维系和自我革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推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是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正面回应,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儒家思想,孔子学说中的“小康社会”或“大同社会”经常为中国改革者提供改革思路,对此他做了以下描述:

19世纪—20世纪中国所有伟大的改革者,作为儒家学者,都在改革初期求助于孔子的乌托邦社会——只有这种社会形态在民族意识中是国家未来繁荣历史规律的象征。例如,康有为,作为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改革运动的领袖,在其历史发展3个阶段的学说中,把“小康”解释为“宁静的时代”或者“统一的时代”,其后就是“大同时代”。<sup>[7](208-209)</sup>

贝列罗莫夫发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有机联系,他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特色之一即在“‘钻到故纸堆里研究’这一枯燥而复杂的过程中挖掘那些未被平常目光发现的小细节,正是这些细节后来在科学和政治中表现出来。”<sup>[3](407)</sup> 当面对蕴含丰富文化资源的“故纸堆”,贝列罗莫夫不断寻求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中

国发挥实践应用的可能性,积极阐发先秦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的发展之路有着它自身的逻辑与历史,贝列罗莫夫在从事中国研究时尤其关注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这是其中国观的一大特点。在贝列罗莫夫看来,儒学的诸多观念在当今中国大有可为,并且中国人民擅于从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并应用于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得到广泛使用。例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优秀品德与价值观念是孔子思想中的修身纲目,儒家提倡的“为政以德”也确定为选官用人的基本原则并长期地延续下来等等。

基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实现了超越与创新:既对孔子思想的内涵有了深入的发掘,又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其进行把握与诠释。由此可见,贝列罗莫夫不仅将孔子思想作为客观的学术研究对象,更是将其视为中国发展的命脉。贝列罗莫夫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如下预测:“与孔子共同存在的中国将有无限的可能性。”<sup>[1]</sup>他将中国发展的前提定为:“中国只有在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国家领导层的政治文化水平——他们是否能够制定出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优化模式。”<sup>[3]</sup>

## 结 语

作为俄罗斯知名的汉学家、儒学研究专家,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及影响力。贝列罗莫夫的中国研究面向广,从古代中国历史到孔子及儒家

典籍《论语》,最终延伸至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联系,看似普通的选题后却是气象万千,直入中国社会的肌理问题。概而言之,贝列罗莫夫多元的身份及所处的学术与时代背景酝酿并推动了其中国观的生成与发展,他阐明了中国是一个“尚古”的国度,孔子思想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中国只有立足于历史、文化才能谋求国家的未来前程等观点。贝列罗莫夫的中国观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理解当今中国及其发展的历史逻辑,他本人更可谓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积极践行者。同时,贝列罗莫夫研究中国的学术路径成为新时代海外汉学的研究范式,即汉学不再是单纯的典籍译介抑或浮光掠影式的简单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对典籍背后文化现象的深入剖析与思考。贝列罗莫夫作为俄罗斯公认的儒学大师,其中国观代表着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认知的大致轮廓并影响着后辈汉学家对中国的进一步研究。汉学家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学术动机,在“他者”视域下形成的中国观将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方法论与知识论的借鉴及补充。

## 参考文献

- [1] 王毅: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研究综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 [2]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M],学林出版社,2013。
- [3]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й: жизнь, учение, судьба[M].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1993.
- [4] [俄]列·谢·贝列罗莫夫著,陈开科译:孔夫子学说在俄罗斯的去、现在与未来[J]//云梦学刊,2000年第6期。
- [5] 陈开科:《论语》之路——记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的翻译与研究[A]//阎纯德:汉学研究(第六集)[C],中华书局,2002。
- [6]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Слово Конфуция[M]. Москва: ТПО «ФАБУЛА». 1992.
- [7]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НР[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КИ. 2007.
- [8]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и легиз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1.
- [9]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тран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A]//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рактике стран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ХГА, 2011.
- [10]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Место эпохи Чжаньго, Цинь и Хань (V в. до н.э.-III в. н.э.) в судьбе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изданием II тома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J]// 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4, № 3.
- [11] 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 [12] 许雁:俄罗斯汉学界的《论语》“新解”——论俄罗斯汉学家贝列罗莫夫的《论语》解读策略[J]//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2022年第3期。
- [13] Переломов Л. С. Конфуций: Лунь юй[M].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1998.

### Russian Sinologist L. S. Perelomov's View of China

Xu Yan

**Abstract** Russian sinologist L. S. Perelomov is honored as “Confucius in Moscow”. H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Analects*, and the study of Confucius' thoughts. During the decades of sinological research, Perelomov formed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erelomov's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sinology, using the method of text reading to explore the sinologist's view of China from three dimensions: his attention to ancient China, his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us and his thoughts, and his predic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Keywords** russian sinologist, Perelomov, view of China, Confucius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中俄学院、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